

稳定与创新：经济腾飞之双翼

——超越宪政决定论与战略决定论之争的经济发展新思维

陆善勇

(广西大学商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4)

[摘要] 关于一国(尤其是欠发达国家)长期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近年来经济学界出现了以杨小凯为代表的宪政决定论与以林毅夫为代表的战略决定论之争。文章运用复杂性科学“混沌的边缘”原理,提出了超越“林杨之争”的假说:在经济发展中起关键作用的,既不是宪政改革,也不是发展战略,而是稳定与创新。也就是说,经济系统只有在同时兼备较高的稳定性和创新性的状态下,才能健康快速发展。在运用一些典型国家的经济发展里程来对这一假说进行实证之后,指出了当前中国面临稳定危机与创新不足的“双重困境”。

[关键词] 经济发展;宪政;战略;稳定;创新

[中图分类号] F1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 - 4434(2005)06 - 0078 - 04

关于一国(尤其是欠发达国家)长期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近年来经济学界出现了宪政决定论与战略决定论之争。对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因为这样不仅可能会诱发理论创新,而且必然激发我们深入探索 21 世纪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新模式和具体实施的步骤。

一、宪政决定论与战略决定论之争

众所周知,关于经济发展,西方主流经济学(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有一个信念,即制度决定经济绩效——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制度起决定性作用。新兴古典经济理论的创立者杨小凯教授更是进一步认为,英美式的宪政共和体制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具体一些来说,在新兴古典经济理论看来,之所以有穷国和富国的差别,其主要根源就是富国有一些好制度和习惯能够有效地减少内生交易费用,而穷国则是缺乏这些有效率的制度和习惯。在这些制度中,产权制度对减少内生交易费用又最为关键。杨小凯认为,只有通过英美式的宪政共和体

制才能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有效的产权制度。

针对杨小凯教授的观点,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撰文指出,英美的宪政共和体制既不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甚至也不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关键在于发展战略,即政府政策能否诱导企业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比较好地发挥它们由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至于政治体制的变革,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发达阶段时才能够顺利推进。然而从世界经济发展史来看,这场“林杨之争”是没有赢家的。

首先,杨小凯教授的观点,无法解释许多重要的现象:德国、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都是在完成了对发达国家的经济追赶之后才废弃专制政体转而采用宪政体制的;新加坡迄今仍未采用英美式的宪政共和体制,经济上还有相当多的国有企业,但是新加坡 1996 年时人均收入已经达到美国的水平;拉美国家独立后均先进行了共和宪政体制改革,但是这些国家迄今经济仍落后不堪、困难重重;而曾经是世界头号强国、被誉为共和宪政体制

[收稿日期] 2005 - 04 - 20

[作者简介] 陆善勇(1967—),男,壮族,广西隆安人,广西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践。

改革先锋和楷模的英国,现在经济发展却不尽如人意,已经落后于许多“曾经的后进国家”。

其次,林毅夫教授的观点则无法解释以下现象:(1)众所周知,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都因实施“赶超战略”而实现经济现代化;(2)以日本为例,1950年代日本生产汽车的相对成本无法与美国竞争,日本政府认为日本没有出口汽车的比较优势,所以制定了限制汽车工业的产业政策,但私人企业自主地跨越式发展没有外生比较优势的汽车制造业,结果日本成了汽车生产和出口大国。显然,如果当年日本私人企业遵循所谓的“比较优势战略”,那么也许就没有后来日本汽车产业的辉煌了。(3)1980年代初期拉美国家经济改革以来,其产业政策的基本原则就是发挥比较优势,包括资源比较优势和劳动力比较优势,但是拉美国家经济迄今仍在困境中徘徊。

可见,上述两种观点之都有一定的片面性。

二、稳定与创新:经济腾飞之双翼

复杂性科学研究揭示,一个复杂适应性系统如果灵活性、创新性不足,过于僵化,那么它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就会降低,从而生命力下降,此即所谓的“秩序困境”;相反,一个复杂适应性系统如果过于无序,变化无常,“常流无住”,那么它实际上很难积累任何建设性的功能,所以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很低,生命力也很脆弱,此即所谓的“混沌陷阱”。复杂适应性系统只有在“混沌的边缘”——同时兼备适度的稳定性和适度的灵活性(创新性)的状态下,其生命力才最强,也只有在这种状态下,它才能健康成长。

本文根据复杂性科学“混沌的边缘”原理提出这样的假说:在经济发展中起关键作用的,既不是宪政改革,也不是发展战略,而是稳定与创新。也就是说,经济系统只有在稳定性和创新性高度统一的条件下,它才能健康成长。下面,我们用一些典型国家的经济发展里程来证明这一假说。

(一)英国的兴衰与德国的崛起

众所周知,英国工业革命的确发生在其宪政革命之后。所以许多人(如缪尔达尔和诺思)认为,宪政秩序决定的政治体制和法律体制导致了以技术革命为核心的工业革命。但是,他们解释不了为什么作为共和宪政体制楷模的英国——曾经是最发达的国家很快被落后的德国和美国所超越呢?而我们知道,当19世纪上半叶英国工业革命接近尾声时,德国的国内统一市场才刚刚形成,但在进入

20世纪时,德国已成为欧洲头号工业强国,到1914年,德国在钢铁以及化学和电力等当时的高新技术产业上已超过欧洲其他所有国家。然而,德国直到1918年才废弃专制的君主政体,采用宪政体制。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费里曼(Freeman,2001)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认为英国后来的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等制度僵化是其基本原因^{[1](P248-256)}。凡勃伦在《德意志帝国与工业革命》(1915)中认为,德国把更发达的技术接过来,最彻底地应用于不受既得利益阻碍的环境中;而在英国,旧制度阻碍了新制度的产生,导致了原生性的新技术发展受到抑制。

(二)日本的兴衰与东亚“四小龙”的崛起

自二战以来,非西方文化传统的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在战后也成功地对当时的发达国家进行了经济追赶。这说明,文化也并非经济发展的关键。

尽管林毅夫否认日本曾经长期实施“赶超战略”的事实,但是多数学者认为,战后日本是在比较稳定的政治和社会条件下凭借“赶超战略”成功地实现了对当时的发达国家进行了经济追赶的。日本政府本身对此也是承认的,日本行政改革会议在其《最终报告》中指出:日本战后形成的社会体制,实际上是一种以赶超欧美发达国家为目标、以发展生产力为使命的“国家总动员体制”。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日本追赶型的产业政策,它以欧美先进工业国的产业结构和先进技术水平为蓝本,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行了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政策。借此,日本战后从一片废墟中迅速崛起,一跃成为人均收入超过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然而,20世纪90年代,美日经济的盛衰却形成鲜明的对照。19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进入前所未有的大繁荣时代,出现的是高经济增长和低通货膨胀。而1991年初“泡沫经济”崩溃以后,日本经济从此一蹶不振,迄今尚未见有明显的复苏迹象。人们不禁要问,目前仍然拥有雄厚的资金和技术的日本,为什么在进入90年代以后为何会落到这等地步?

多数学者认为,能否实现“新经济”的转型是美日经济出现盛衰交替的根本原因。

杨小凯则认为,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经济停滞是由日本不彻底的宪政体制改革造成的。然而,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众所周知,被杨小凯认为是宪政体制改革先锋和楷模的英国迄今也并未实现“新经济”的转型,其经济增长也并不尽如

人意。可见,这并不是一个宪政改革的问题,而是一个创新的问题。

事实上,在经历了长期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日本为实现赶超目标而形成的高度集中的产业体系已显得过于封闭,在政府主导环境中形成的某些做法也慢慢地“硬化”为一种“惯例”,妨碍了已经发育起来的市场机制充分地发挥作用,扼制了民间的创新活力。僵化的政府体制又难以适应市场变化更加复杂、产业替代竞争更加激烈、信息渠道更加分散、预期的不确定性空前增加及创新风险愈加加大的新经济特点,从而使日本未能完成“新经济”转型,进而导致了日本经济运行陷入了一种近乎停滞的状态。

(三) 拉美国家、俄罗斯与印度

拉丁美洲自独立以来,陆续引进了欧美的政治制度,包括宪法、议会和政党制度等,并且实施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林毅夫也将之称为赶超战略),但是成效并不显著。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债务危机的爆发,拉美国家才放弃进口替代模式,开始进行以政策变化为标志的经济改革。从拉美国家经济自由化改革以来,其基本原则就是发挥比较优势,包括资源比较优势和劳动力比较优势^[2]。尽管如此,20世纪80年代仍然是拉美国家“失去的10年”。人们甚至担心,21世纪头10年拉美地区还会步“失去的10年”的后尘。

而我们知道,一直以来拉丁美洲国家的军事政变和政局动荡是举世闻名的。拉美地区一直以来社会问题非常突出,社会结构十分脆弱,稍有风吹草动就会酿成大的动荡或危机。

可见,政治和社会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前提。俄罗斯的情况也说明了这一点。

众所周知,20世纪90年代,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俄罗斯顷刻之间从专制的计划经济走上了宪政的市场经济道路。然而,10多年来俄罗斯经济一直处于倒退和低迷的状态之中。究其原因就是,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陷入了混乱不堪的“坏的市场经济”泥坑之中。

另外,林毅夫教授将苏联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其实施的赶超战略,并将这种赶超战略与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等同起来,这是不正确的。事实上,赶超战略并不必然导致计划经济(体制),如前所述,德国、日本以及韩国等国家都曾经实施赶超战略,但这些国家都没有因此而形成明显的计划经济(体制)。因此,苏联失败的原因只能归咎于计划经济(体制),而不能归咎于赶超战略。关于这一点可以

从印度经济发展的情况中得到证实。

印度独立后半个世纪以来,最大特点之一就是政治社会保持相对稳定,没有出现重大的危机和动荡。独立后,印度选择了国家主导型的混合经济体制,并且实施计划经济浓厚的赶超战略。在独立之后的30年里,印度的经济一度是世界上管制最严厉、最封闭的经济之一。在国有经济政策和严厉的许可证、配额制度的束缚下,印度的经济表现是令人失望的,1950~1980年年均仅增长1.7%。所以,印度经常被作为错误发展战略的反面典型。

然而,自1980年开始,印度的人均经济增长率增加了一倍多,1980~2000年的年均增长率为3.8%。1990年代中后期的部分年份增长率接近6%。现在,印度已经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新的研究指出,其根本原因在于1980年代早期印度开始抛弃以前的计划经济政策,中央政府对私营企业的态度从敌视转变为支持。而在这一时期(1980年代),印度事实上并没有放弃赶超战略。事实上,即使1991年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启动了经济自由化政策以来,印度也并未放弃其赶超战略。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印度政府以软件产业为重点大力推进高技术产业发展。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就决心“用电子和教育把印度带入21世纪”。20世纪80年代后期,印度政府根据信息技术发展的趋势,专门制定了重点开发计算机软件的长远战略。90年代末,印度设立了国家信息技术和软件发展工作办公室,提出了包括108条政策措施的《信息技术行动计划》。现在,印度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软件生产和出口大国之一。

综上所述,在经济发展中起关键作用的,既非宪政改革,亦非文化,更非战略,而是而是稳定市场环境下的不断创新(包括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

三、中国经济面临的“困境”及其出路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成就。中国经济连续二十多年来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国家政治社会稳定以及在此基础上经济体制改革创新和以引进为主的技术创新。然而,今天中国却面临着稳定危机与创新不足的“双重困境”。

(一) 迫在眉睫的“稳定危机”及其根源

现在,有一种正在广为流传的观点是: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是国家发展的一个临界点,走

过了这个临界点,一国就有可能向社会稳定、共同富裕的当代欧美国家的方向发展;走不过这个临界点,一国就会出现所谓的“拉美现象”:贫富悬殊、失业激增、分配两极化、社会矛盾激化,导致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社会动荡和倒退。

显然,中国正站在这样的十字路口上:2003年,中国人均GDP首次突破了1000美元。

而今天的中国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拉美有许多相似之处:两极分化、腐败、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农村发展缓慢以及地区差别扩大,基尼系数突破国际警戒线,自然环境日益恶化,自然资源日益枯竭,而日益严重的发展差距演化为日益严重的社会冲突等等。

因此,近来许多人在思想上、理论上开始质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改革是否错了?我们是否离“拉美陷阱”仅一步之遥?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危险”,其根本原因是强势利益集团的形成以及制衡力量(包括中央控制力和弱势群体谈判力)的下降。这些强势利益集团包括部门利益集团、地方利益集团、富裕群体等等。当这些强势利益集团失去制衡时,它们就会恃强凌弱(主要是指利益集团掠夺与分利的行为,如“圈钱”和“圈地”行为),其结果是形成两个越来越大的集团,即强势集团和弱势集团。而从当前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以及宏观经济政策效果不甚明显等情况来看,中央政府对这些强势利益集团的控制力可能在降低。如果任由这种态势发展,强弱两大集团最终会走向对抗,导致社会动荡,经济徘徊不前。

(二)“创新不足”及其根源

这里讲的“创新不足”主要表现为体制创新能力低下以及科技创新能力低下。事实上,这是导致当前失业严重、能源短缺、资源枯竭、环境恶化、产品竞争力低下的主要原因。而“创新不足”的根源是“准计划经济”。

众所周知,迄今为止我国仍然是混合经济,既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也不是过去意义上的计划经济,而是在很多调控领域有计划的“准计划经济”。由于政府和企业之间关系问题、计划与市场的问题、垄断与放松管制的问题没有完全理顺,经济运行机制不畅,市场秩序混乱,资源配置扭曲,其结果是导致中国整体效率的低下^[3]。例如,我国单位GDP的能耗5倍于世界平均水平。再如,例如在《2002-2003全球竞争力报告》的技术指数的排序上,中国仅列第63位,排在突尼斯、毛里求斯、博茨

瓦纳、多米尼加、纳米比亚等国家之后。由于“准计划经济”的存在,国家的资源都主要流向了总体上没有就业增长的国有经济部门,能带来就业增长的民营企业的发展因此受到抑制,其结果是总体失业严重。

而从“准计划经济”中获利往往是一些强势利益集团——大企业、行业部门、地方政府,所以对于“准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也往往受到它们的抵制,使得经济体制改革困难重重,步履维艰。中央出台的改革政策(包括宏观经济政策)往往都“下有对策”,严重阻碍了国家整体效率的提高。

(三)应对之策

从上述可知,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危机与困境的主要根源是强势利益集团的过度膨胀。如果任由它们发展,必然导致社会失衡和分裂(包括国家分裂——如果“台独”势力过度膨胀的话)。因此,当务之急是“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一方面要增强中央的权威,以便有效遏制腐败以及各种强势利益集团的无良发展,减轻弱势群体的不满情绪,构建一个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另一方面,要大力推进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营造一个公平公正的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让各个利益主体享有充分的经济自由,并充分享受自己的生产和创新成果。

事实上,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五个统筹”的科学发展观,近来又提出建设和谐社会,都表明了中央决策层对“稳定与创新”高度重视。“稳定与创新”是就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归根结底是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所以,“稳定与创新”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一脉相承的。因此,保持“稳定与创新”的高度统一是国家长治久安、和谐发展的根本。

当然,发展的目标是多方面的,但是各个方面的工作都应该围绕“稳定与创新”这一主题来展开。限于篇幅,本文不打算就此展开讨论。

[参考文献]

- [1]苏振兴.拉美工业化模式转型的经验教训[J].中国改革,2003,(12).
- [2]Freeman, C. and Louca, F., As Time Goes By: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s to 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3]徐宏源.中国渐进式改革经济隐患凸显[J].新华文摘,2004,(15).

[责任编辑:罗运贵]